

A Study on Linguistic Turn of Analytic Marxism

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语言学转向”研究

吴长青 著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资助：“语言学转向”视域下
主义研究（项目批准编号：11YJCZH185）

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语言学转向”研究

吴长青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研究/吴长青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3

ISBN 978-7-216-08539-7

I. 分… II. 吴…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6298号

出品人:袁定坤

责任部门:时政经济分社

责任编辑:曹新哲

封面设计:董 昀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谢 清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市科利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226千字

版次:2015年3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216-08539-7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430070

印张:13.5

插页:2

印次: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导论	1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	1
二、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5
三、国内外有关本研究的现状	18
四、研究思路、主要内容以及创新与不足	23
第一章 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考证	29
一、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	29
二、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方法	45
三、现代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56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60
第二章 分析学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再阐释	69
一、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	69
二、分析学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再界定	77
第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解释魅影下的辩护	86
一、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界定	86
二、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界定	106
三、“发展命题”与“首要性命题”	113
四、功能解释的去魅	118
第四章 阶级理论：一种分析式的重构	136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及文本依据	136
二、赖特中间阶级概念的约束性重构	147

► 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研究

三、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分析的一般框架的构建	162
四、赖特中间阶级概念重构的当代意义	173
第五章 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代结语	187
一、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失	187
二、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未来	194
参考文献	206
致谢	214

导 论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

发端于 20 世纪 20 年代,以匈牙利的卢卡奇、德国的柯尔施及意大利的葛兰西为代表的一股有别于恩格斯、列宁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思想被理论界命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中欧及西欧革命却遭到了失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哲学运动和西方文化传统合力作用的结果。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在总结中西欧国家革命失败原因,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认为革命失败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之阶级意识的丧失,而这又是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决定论的直接结果。从实践而言,他们认为,在中西欧无法照搬俄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这一阶段的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分别著述阐释一种不同于恩格斯、列宁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新的理解,也因此受到了共产国际内部的尖锐批评。直到 1955 年, M. 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在对包括卢卡奇在内的这股思潮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运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来指称这股思潮,并强调这一思潮与列宁主义的对立,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被人们广泛运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自诞生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大体被公认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即 20 世纪的 20—30 年代。这一时期的思想尚处于萌芽和形成时期,并未完全形成完整统一的社会思潮,以卢卡奇、柯尔施及葛兰西为主要代表人物。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 1885—1971)是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在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 1923 年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被公认为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这

部著作中,卢卡奇主张用总体性的观点代替经济动机作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否定经济的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提出了“总体性辩证法”、“物化理论”、“阶级意识理论”等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论题。^① 卢卡奇一生的学术思想颇为复杂,具体而言,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19—1929年的十年,这一时期是卢卡奇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时期。在十月革命的胜利的鼓舞下,匈牙利于1918年10月爆发了无产阶级的武装革命,并于1918年11月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随即成立。卢卡奇成为匈牙利共产党员并很快担任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主管文化和教育的人民委员,但不久,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革命宣告失败,卢卡奇被迫移居流亡维也纳。在维也纳期间,卢卡奇曾主办和领导左派刊物《共产主义》。这一时期,由八篇卢卡奇的论文结集而成《历史与阶级意识》公开出版,在此书中,卢卡奇以物化、总体性、阶级意识、主客体的统一等范畴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注解,这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引起了轰动效应,影响深远。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理论无异于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机械论、宿命论和经济决定论等错误倾向的宣战,因此获得了众多理论界学者的赞同与信奉,也由此遭致包括共产国际的领导人 and 理论家的严厉批判和指责。由于这十年卢卡奇主要在维也纳活动,这一时期的卢卡奇学术思想也可以称作为“维也纳时期”。第二时期是卢卡奇相对远离政治的时期,即:1930—1945年。这一时期,卢卡奇赴苏联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潜心从事理论研究,其思想更接近于共产国际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立场,因此往往被称作卢卡奇的“斯大林主义时期”或“苏联时期”。这期间,他除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许多观点做了自我批评之外,他还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存在主义等现代人本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主要著述包括:《青年黑格尔》、《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理性的毁灭》等。第三阶段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卢卡奇重回匈牙利担任布达佩斯大学哲学和美学教授的时期。这一时期,卢卡奇在进行理论著述的同时,也热情投身于匈牙利的社会改革运动和民主运动,并因此受到尖锐批评。在理论研究方面,他继续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一些观点进行自我批评,但另一方面,他又超越了苏联时期保守的斯大林主义立场,试图以社会存在本体论、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6页。

日常生活等新的理论范式来阐释自己的观点。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包括：1963年的《审美特征》和1971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

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 1886—1961)是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是德国共产党内部著名的理论家,1923年,他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发表,同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被并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针对当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还是资产阶级学者都予以否定与割裂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内在联系,柯尔施主张“恢复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并明确将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归结为以一种包含哲学批判、经济批判和政治批判在内的“总体的马克思主义观”,柯尔施的这一思想被西方理论界称为“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而言,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论著中首先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特别是考茨基等人提出的曲解、抛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否定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关系,进而否定历史发展规律中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提出应当恢复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的关系。柯尔施认为,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否定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内在联系的根源在于,他们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要废除哲学的论断,错误地将马克思、恩格斯所要废除的旧哲学理解为是“所有哲学”,不能“仅仅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具有的不只是理论的,而且也是时间的和革命的目的,就说它不再是哲学,这是不正确的。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①其次,柯尔施在这部论著中提出了“总体的马克思主义观”。柯尔施明确将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归结为一种包含哲学批判、经济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内在的“总体性理论”,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作为具有总体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柯尔施进而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是:第一时期的从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表现时期;第二时期是从1848年的巴黎公社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与实践相脱离的纯粹理论批判;第三时期则是从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并延续到一个还不确定的将来,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内在联系重新被加以重建的时期。柯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关系的论述遭到了共产国际严厉地批判,甚至在1926年他被开除出德国共产

^①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党,之后,柯尔施作为一名自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相继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对列宁哲学进行了批判。后期,柯尔施著有《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34)、《卡尔·马克思》(1938)等几部论著,集中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四个基本原理及马克思主义观,这些论著也充分反映了柯尔施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观。

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 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优秀领袖,也是杰出的反法西斯战士及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从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入手,在继承拉布里奥拉的“哲学、政治、历史三者一致”的思想基础上,结合他对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实践探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出了卓有成效、独具创造性的阐释,其实践哲学、市民社会理论、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等,对当代西方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代表作有《狱中札记》等。《狱中札记》是葛兰西1926年11月不幸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入狱后在监狱中完成的32本札记书稿。尽管葛兰西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但他坚贞不屈,一方面义正严辞与法西斯分子斗争,并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思考研究革命理论;以“实践哲学”来指代马克思主义,以回避各种审查。《狱中札记》被认为是意大利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其实践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想意义深远。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内涵首先强调了“实践哲学史关于人、自然、社会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践哲学的“实践一元论,它肯定不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也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而是具体历史行为中对立面的同一性,也就是与某种组织化(历史化)的‘物质’,以及被改造时的人的本性具体地、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中对立面的同一性”。此外,葛兰西还明确地提出实践哲学是一种绝对历史主义哲学的论断。葛兰西政治哲学的思想表现在将国家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部分,“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以称作为‘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更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这些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国家是受强制盔甲保护

的领导权”。^①葛兰西的这一界定,一方面反对了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的机械决定论和技术、经济还原论的解释。同时他也是在继承了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有着卓越的贡献。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得以产生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结果。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国际得以建立,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推行“布尔什维克”运动,要求各国共产党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在各国开展社会主义的革命,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被当作当时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其他哲学则被批判为“异端”或“修正主义”。在苏俄模式的指引下,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却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不得不引起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家进行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欧洲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文化传统不完全同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有必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一条适合西欧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一反思导致了西欧共产党内理论家的大争论,聚焦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质”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革命辩证法还是其具体的结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发表正是这场争论的导火索,以至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西欧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分化,同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理论家的对立与论辩,这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流派得以产生的内部动因。其次,西欧当时所面临的不同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既是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外部条件。这一时期,西欧的社会历史条件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两者的社会结构及统治方式的历史性差异,西欧国家的市民社会较为发达,而俄国在国家专制暴力统治下,并没有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化;另一方面,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经济决定论及机械决定论的缺陷必然导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降低为一种脱离辩证法的经验科学,这一理论指导下也必然导致对工人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的培养,从而脱离了西欧社会历史条件的实际情况,无产阶级无法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袭,脱离西欧社会历史条件的社

①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会主义革命事业也必然会以失败告终。鉴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应该根据西欧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性革命”模式来代替苏俄的单一“暴力革命”模式。葛兰西就曾分析了西欧与俄国社会历史条件的这种差异:“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还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在西方,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挺身而出。国家只是外围的壕沟,后面屹立着一个强大的堡垒工事网”。^①西欧不同于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导致照搬苏俄模式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反思这一失败原因所客观存在的差异性提供了外部环境,为其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第三,对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反思、对西方现代性的哲学文化思潮的反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得以产生的动力。自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就在启蒙理性的指导下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按照启蒙理性的指导,理性与科学可以让人们走向自由与幸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际状况却不断背离这一自由与幸福的乌托邦王国,资本主义国家物质财富在不断丰富与积累的同时,人的价值却不断地下降,出现了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现代社会的两难困境”。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反思理性主义哲学和反思现代性的哲学文化思潮,流派众多,观点各异,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时代大潮流的产物,他们从更加注重实践论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思考。

第二阶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繁荣时期,即20世纪的30—60年代末。这个时期出现的流派众多,包括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及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这一时期的理论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哲学家的马克思”,力主对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心理根源进行反思,力主对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大众文化、发达工业文明进行反思与批判,以期用新的西方社会思潮来解释、补充和重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以阿尔都塞为主要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有结构的整体”性解读。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 1918—1990)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主张

^①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李鹏程译:《葛兰西文选(1916—1945)》,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页。

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在 20 世纪的 60 年代将结构主义方法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其“有结构的整体”强调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在不同层面所构成的整体。阿尔都塞由此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和“多元决定”的历史观。^① 阿尔都塞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即认为,马克思并不是从人的本质出发来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阿尔都塞既反对当时流行于共产党内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反对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的政治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态度,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己任。^② 阿尔都塞的所有理论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部分就是其著名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理论集中体现在 1965 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见《保卫马克思》)和 1970 年在法共机关刊物《思想》杂志上发表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哲学与政治》)两篇文章中。其次是以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为主要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解读模式。作为“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Volpe 1895—1968)和科莱蒂均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核心概念“社会生产关系”不但有西方哲学唯物主义决定论的思想,而且还兼具了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传统思想。

此外,自 20 世纪 20 年代诞生至今的法兰克福学派,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高峰。法兰克福学派自创立到流亡到繁荣最后到转折的四个时期内,涌现了大量的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施密特等著名的理论家与社会活动家。他们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进行了严厉批判,并以其理论亲身参加并指导社会活动。马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 1895—1973)是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致力于建立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理论,提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对现代资本主义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方面进行多方位的研究批判。霍克海默一方面赞同社会研究要坚持经验的研究路向,另一方面反对只讲经验而忽视规范的实证主义

①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36 页。

② 王雨辰,杨礼银,吴长青:《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7 页。

做法。他在担任法兰克福研究所所长期间,吸收了一批经济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进所,包括崭露头角的阿多尔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弗洛姆等,旨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对研究工作进行了重大改革。1932年,社会研究所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在他的领导下,法兰克福学派初现雏形。之后,随着法西斯的上台及二战的爆发,法兰克福学派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流亡时期,直到二战结束,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多次建议与安排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曾经成员结束了海外的流浪生涯,回到法兰克福大学,重启这一学派的研究,并将这一学派的研究推向了巅峰,使这一学派由德国的研究机构转变为世界性的研究机构。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人员众多,理论研究庞杂,但总体而言,作为一个统一的学派,其思想主要围绕四个主题,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理性观、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及乌托邦理论等方面展开的。希奥多·阿多尔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早年结识霍克海默并成为其终生好友,1947年与霍克海默合著《启蒙辩证法》,1966年,发表《否定的辩证法》,这两部代表作被认为是阿多尔诺最具代表性的论著,尤其后一部作品被誉为“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逻辑发展的最高水平”。^①阿多尔诺在哲学、社会学、美学三个领域中造诣颇深,著述丰厚,在德国出版的作品达20多卷。力图使社会研究所成为具有批判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核心,组织编辑出版了几十本有关社会批判理论的丛书,扩大了法兰克福学派在国内外的影响。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纯粹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于1941年发表他的第一本重大著作《逃避自由》。1947年出版其续集——《为自己的人》。这两本著作概述了弗洛姆的人的本性理论中人的性格理论。弗洛姆最流行的著作是1956年出版的《爱的艺术》,他在这著作中概括并补充了《逃避自由》和《为自己的人》及其他著作中的人性理论。弗洛姆提出了所谓“社会性格”的概念^②,弗洛姆主张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马克思历史理论进行补充,他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具有共同的三种精神:怀疑一切的批判精神、对真理的执着精神及人道主义的精神,这也构成了弗洛姆本人思想的精髓。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

^①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页。

^② 黄继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解释概览》,《理论探讨》2009年第12期。

之一,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由于其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哈贝马斯著作丰厚,其中以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话语交往等学说为其主要理论。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理性化进程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的发展和在各个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然而技术理性本身无法解决生活世界的价值观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自身的活动存在着交往理性的潜力,由此,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交往的乌托邦概念,试图通过话语沟通行为的理性化进程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诸多危机。在其晚期,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伦理学”和“话语政治学”。话语伦理学的使命就是在多元化的社会条件下,面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范、文化价值之间的无序冲突,给出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如何进行理性的话语交往而达成共识的条件,从而有助于构建一个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话语政治学则试图通过对话语民主模式的构建来重振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的形象,以此来构建一个无限交往的乌托邦。^①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内有学者将其界定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并认为,之所以这样界定,其原因是“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与马克思哲学有着直接的理论渊源,而且他们都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论研究始终是围绕探索马克思哲学的真谛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展开的,他们或者是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路人。”^②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20世纪的30年代后的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走向繁荣,是与这一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考及对这一时期法西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反思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繁荣。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公开发表,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期在力图探索马克思和恩格斯

^① 王雨辰,杨礼银,吴长青:《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118页。

^② 王雨辰,杨礼银,吴长青:《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 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研究

思想的联系,力主从人、人道主义和异化这些角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找到了马克思文本依据。《手稿》不仅清楚地阐释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思想上的联系,而且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异化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强调“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①马克思《手稿》的公开出版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述资本主义并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找到了依据,并为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人、人本主义、异化、人道主义等多重视角解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马尔库塞就曾论述《手稿》对重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置于新的基础之上。”^②弗洛姆也强调“马克思的哲学也代表着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成物。马克思的哲学在《手稿》中获得了最清楚的表述,他的核心问题就是现实的个人存在问题,人就是他实际呈现的样子。”^③此外,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在这一时期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从文化心理的视角,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剖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包括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阿多诺的《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赖西的《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为自己的人》、《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等。^④可见,这一时期,法西斯主义的盛行客观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其交锋与论战,也客观促进了这一学派的繁荣。第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二战以后的新发展、新变化的探讨与反思客观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二战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电子电气化为标志的新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

①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② [美]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③ [美]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5页。

④ 王雨辰,杨礼银,吴长青:《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高了社会生产力,社会财富也得到了充分的积累,社会阶级结构深层次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工人阶级日益分裂为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下,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日益淡漠,资产阶级借助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巨大变化,通过各类资产阶级媒体鼓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对工人阶级实行“总体统治”。面对这一社会的新变化及资产阶级统治的“新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反思并主张对资本主义展开社会批判、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价值的批判,以促进工人阶级的主观精神的发展,形成工人阶级的自主意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针对这一社会反思的论著,包括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及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等。与此同时,在面对苏俄模式下,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自身也进行了剖析与反思,如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及《列宁与哲学》的论著里,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论著里就蕴含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的反思,这客观上也丰富并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阶段被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或者新发展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研究也日显复杂。一方面,以探求马克思主义真谛,探索适合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本书所重点阐述的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等;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如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思想流派,包括借助后现代理论,既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又要求解构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等。20世纪的90年代初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又从哲学、文化问题转向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研究重心从对资本主义批判转向研究市场社会主义;前苏联东欧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合流。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分析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流派的兴起,使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模式更加多元化。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从学术背景来看,其前半期是一个文学研究家,代表作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均有较高的社会声誉,三部作品也被称为“马克思主

义的三部曲”；后期的詹姆逊更多的是以“文化批评家”出现，将研究志趣转移到“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在出版了《政治无意识》之后，他的视野转入了文学的外部文化环境，开始了对后工业社会的总体性观察。1982年，他在美国惠特尼博物馆发表了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的演讲，标志着他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独到的思路，在资本扩张与文化生产之间探索深层的关联。之后，出版《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可见的签名》、《地缘政治美学》、《时间的种子》、《文化转向》等论著，聚焦于弥漫在西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并将其纳入历史化的语境中进行分析，詹姆逊也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社会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面，詹姆逊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模式、生产方式进行了新的解释，并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决定论”，鉴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复杂性，詹姆逊主张用新的方式来解释或替代这种复杂的关系等。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产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理论流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威廉·莱斯。法国学者安德鲁·高兹以及英国学者戴维·佩珀等，这些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批判西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学理论，立足于制度批判，从制度维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等三个方面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及解决之道，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及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极大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考。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或社会历史事件有如下几项：首先，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与质疑，在面对高失业与高通胀的经济滞涨问题时，凯恩斯主义表现得无能为力，西方经济在经历了战后的繁荣之后，开始走向衰败。这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得以高歌猛进，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际意识形态的主流，这就进一步挤压了西方左翼力量的政治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开始步入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发展道路。此外，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性危机日益严重，这为孕育新的社会运动与新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发展性的危机突出表现在一方面社会的物质财富极端丰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双刃作用导致全球性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人口危机等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针对这些社会危机，在生态运动